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 持续推进发展与减贫

■ 丁栋 董冠洋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27日在北京闭幕并发布《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共同宣言》(以下简称《共同宣言》)。《共同宣言》称,全球解决发展不平衡、大量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等任务依然很重,发展仍然是解决众多全球性挑战的基础和主题。全球应继续聚焦最贫困人口,将减贫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峰会是一次全球智库思想和智慧激荡的盛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代表、专家、学者和前政府高官等参加了本届峰会,体现了全球智库峰会“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宗旨。峰会以“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年后新路径”为主题,围绕八个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分析了近年来全球经济状况和其后的发展趋势,对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内容提出了建议。

中国智库:产出思想 国际发声

《共同宣言》指出,智库在解决和处理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有待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共同性重大挑战增多,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包容互

鉴的大环境下,各国智库在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维护世界和区域和平发展环境、引导国际舆论、凝聚人类智慧等方面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会议希望,各国智库能够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升自身能力,加强与政府、公众和媒体的互动,并加强多种方式的智库交流合作,相互借鉴,不断创新,共同发展。

两年一度的全球智库峰会,已经成为集中观察中国智库角色与作用的一扇窗口。现在,中国的智库不仅要产出思想,还要国际发声。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在今年初公布了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其中指出,中国大陆智库总数是429家,位居全球第二。但智库水平与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中国智库有三多三少:被动的多、短期的多、流于空泛的多;我们拿出的方案和目标期限比较短,前瞻性少,创新少。尤其是在解决问题和提供产品方面和国外差得比较远。

智库最核心的要求是生产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因此,智库人员必须具有全球战略视野,要提出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接地气的解决方案。只有着力培养品牌意识、前瞻意识、创新意识、全球意识,付出艰辛努力和切实行动,才能全面提升智库影响力。

治理目标:持续减贫 绿色发展

“全球治理还存在着效率不够高、协调性不够强、规则不够合理等问题,应继续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提出,应更好地发挥联合国、G20等全球治理平台在危机治理、全球共同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中,对于联合国在世纪之交所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共同宣言》认为,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应通过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面向贫困群体的小微金融服务等措施,以及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等比较优势和发挥民众积极性、动员社会各方力量、采用“以工代赈”等多种方式,更有效地解决减贫问题。

全球经济发展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在不断增强,但不能因此而放缓经济发展的步伐。无论是减排温室气体、环境保护,还是经济转型,都应当在推动发展、实现减贫的基础上进行。绿色发展也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共同宣言》称,应探寻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增长;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互联网+”等措施,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各国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调整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技术合作和转让、增加资金投入等途径,提高节能减排水平。

听国际智库说中国

■ 陈学慧

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

为期2天的会议,9场大型研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吸引了近3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00多名代表参会。会场上,外国专家比中国嘉宾多,会说中国话的外国嘉宾多,堪称“中国通”的外国专家也多。让我们一起听听外国智库如何评说中国的发展。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的智库

我很高兴再次回到中国,这是我在过去30年第125次来到中国。中国发生了巨大改变,已从文革时期的封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且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大国,中国的智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世纪全球化的速度及力度会影响全世界的政府决策。全球化的程度越高,面临的政策挑战就越大。全球机构不能单打独斗解决所有问题,但国家政府彼此之间密切合作,却可以产生巨大影响。无论是外交政策、经济政策还是

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建立智库之间的联合政策委员会。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我们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的智库,需要公共领域和私营部门的智库。35年前有人说,我们需要加快步伐,以更好地利用清洁能源,现在我们需要在可持续能源方面展开更好的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全球合作基金会主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

“一带一路”是全球性计划

首先谈谈气候变化。巴黎气候峰会将举行,中国的参与将非常重要,因为中国非常大,而且中国在这个领域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明年中国将成为G20的主席国。在G20机制中,中国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扶贫领域取得的进展是非常巨大的,而中国在扶贫方面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脱贫人口的总数,比其他国家的人数还要多。世界的发展状况在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要比那些高收入国家高,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能达到5%至6%。所以,要解决扶贫问题,推动发展中国家尽快发展非常关键。

在全球治理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进步非常快。“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性的计划,它将影响世界40%的人口。在这一计划之下,不仅中国和欧洲之间会建立一种联系,很多中间地带国家如中亚国家也将纳入其中。中国可以此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责任度将是今后世界发展的关键。

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

希望亚投行取得成功

中国是不是能够发挥领导力?其他国家是不是允许中国发挥领导力?亚投行是一个非常

好的样板。感谢中国提出设立亚投行。50多个国家将会签署备忘录,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希望亚投行取得成功。

我参加了每一届全球智库峰会,提出了不少建议,也和中方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中国和美国最近举行了战略与经济对话,在APEC上也进行了比较好的协调。中美讨论国际上的问题,不仅要有这样从上至下的正式渠道,还需要有其他一些民间渠道,能够进行开放的、包容的对话,比如全球基金会在治理和其他方面提供建议等。这种非正式的沟通渠道,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应该而且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耶鲁大学教授、摩根斯坦利前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

中美要着眼于最佳政策

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是深深依存的关系,美国要依赖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中国要依赖于美国的市场来实现其出口策略。但这种依存是不可持续的,可能会引发很多矛盾。

中国改变了相互依存关系的规则,从出口向消费转变。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最大的借贷方中国在用自已的投资来支持一些项目,比如“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等。美国要走以前的老路,却没有中国继续向其投资,为了补足这个缺口,就要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TPP是没有包括中国的,亚投行是没有包括美国的。

重要的是,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美两国都要着眼于最佳政策。中国在试图用消费驱动增长,从顺差、储蓄转向消费,而美国的经济则应把储蓄作为驱动力。美国人喜欢消费,不想存钱。可是如果不把储蓄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于美国人民,投资于制造业能力的增长,使美国更具竞争力,那就会遭遇麻烦。中美两国都是大国,需要做得更好一些,才能够形成合力。



全球智库大佬“号脉”中国智库发展

■ 彭大伟

“麦甘先生的智库排名对于中国像是‘叫早电话’(Morning Call)一样,比较早地让中国人在智库发展方面看到了差距,也让我们感受到压力,去提升自己。”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笑着用上述比喻来邀请坐在她旁边的詹姆斯·麦甘为中国智库发展支招。

作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领导的团队每年推出的全球智库排名,被认为是国际上最权威的智库领域“英雄榜”之一。

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全球可持续发展:智库

的作用”专题分论坛在北京举行。詹姆斯·麦甘与来自美国、英国、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智库负责人一起就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近年来,中国官方给予智库前所未有的重视。201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詹姆斯·麦甘建议,应进一步促进中国智库间的竞争,并鼓励独立智库群体的增长和商业、法律、金融等领域智库的多元化发展。

詹姆斯·麦甘说,一些国家的智库人士曾向他反映,有时无法获得研究所需的关键数据。他呼吁,政府应该提供经费,让学者更好地利用网络上的资源,让智库能够获得更好、更高质量的数据。“同时要创建一个全国性的智库间网络,共享资源和发布成果。”他补充道。

智库是否仅仅意味着为政府的决定“背书”或是“论证”?英国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部主任伊恩·邦德表示并非如此。

“英国政府认识到智库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一定要挑战政府的计划和政策,并且积极进行测试,来发现这些政策的漏洞。”他介绍道。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兼CEO弗雷德里克·坎普表示,未来的优秀智库必须是跨越国界、跨学科

的,“我们不能只是在狭隘的一个领域成为专家,我们必须和其他专家通力合作,并且善于和媒体等各方面打交道。”

相对于国际同行关注的上述问题,中国智库负责人则讲述了更多本土的、具体的经验或困境。

对于制约智库发展的经费问题,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表示,目前中国许多智库依赖财政经费,但财政经费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

“财政资金不能作为智库的主要来源,而应该吸引社会上的资金,但是中国的社会资金进了智库不能随便免税,所以需要有一个大的财税方面、财富分配方面的改革,让社会资金能够合理地进入智库,使智库越来越减少对财政的依赖。”黄仁伟将之称谓为“根本性的”改革。